

【农村社会发展】

制度性作物与弥散性作物:农业产业发展差异形成的作物特性机制

——基于中部一个县域两种农业产业的比较研究

桑坤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即便两种作物有着相似的政策环境、组织过程,在产业的社会经济效果上也会大相径庭。学界偏重于从政府的产业治理、市场逻辑乃至农民的生计选择对此加以解释,却未能充分阐明作物特性之于产业发展的前置性因果。农业社会学的作物特性机制强调从农业的两重性出发,突出作物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从而揭示作物、产业、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贡县白莲、大棚蔬菜两种作物及其关联产业的比较研究发现,作物根据其特性可分为制度性作物与弥散性作物两种类型,并在作物与市场、农民社会生活的融合过程中呈现出制度性产业与弥散性产业两种类型。制度性作物与弥散性作物连通了产业的生产组织、市场过程,进一步牵动了产业的实际经济效益,诱导出农民社会生活样态,从而使一些作物能够顺利扎根乡土,另一些则不被农民接纳。制度性作物与弥散性作物各有其合理性,应结合地方作物结构、农民生计体系、劳动力条件等民情基础,寻找具有内在亲和力的产业担纲者,以助力产业发展。

关键词:作物特性;产业特性;制度性作物;弥散性作物;农业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F321;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3)02-0045-1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因而应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发展地域特色鲜明、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的乡村产业,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①。显然,乡村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增进作为生活主体的农民的福祉,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农业产业发展通常存在政府的产业逻辑与农民的生计逻辑两种进路。其中,政府的产业逻辑有两种:一是支配市场。即通过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联结过程,创造不同的制度结构以塑造产业竞争力^[1];或者采取打造典型产业的策略,改变要素配置方式^[2]、制定指标体系、调整产业结构^[3],为农业产业发展赋能^[4],并形成更新率快、典型性强的产业格局^[5-6]。二是改造农民。即增加对农民的资本、技术投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养^[7],以优化农业产业链^[8],降低农民发展农

收稿日期:2022-0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实践路径研究”(22CSH0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21AZD04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2批面上资助项目(2022M720251)
作者简介:桑坤,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①《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6/28/content_5404170.htm。

业产业的中间交易成本,提高投入回报比例^[9];或在横向上扩大经营规模,引导多样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如公司+农户)^[10-12],借由企业、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13-14],以发挥市场要素优势,提高生产效率。然而,政府行为易造成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农民发展农业产业的主体性问题,毕竟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一定能有效惠及农民个体,甚至可能带来资本对产业链的控制,排斥、挤压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导致农民分化、贫富差距的后果^[15-17]。显然产业发展不能就产业而产业,应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18]。在大国小农国情下,农业产业的发展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社会过程,而非支配市场、改造小农的经济过程。

就农民的生计逻辑而言,农民并非经营能力不足,而是出于生计生活的考虑,农民的产业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动,而是一项社会经济行动。理论上,农民作为生产主体,是典型的“经济学家”,在要素投入与回报上有理性的计算,经济效益高的产业也容易受到他们的青睐^[19]。但农民发展产业时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努力在劳动投入与家庭消费之间取得平衡。满足家庭成员社会生活需求是农民经济行动的源动力。在实际的生产管理过程中,农民的经济行为离不开道义互助^[20],从而产生合伙、换工等互惠行为。由此,农民是一个综合小农,既是利润追求者,也是生计维持者,还是时刻面对资本的耕作者^[21]。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表现出多元的经营倾向,既进行农业种植,又从事非农生产,以满足家庭的多样化需求^[22]。同时,作为生活主体,农民充分利用地方区位条件、自然资源与文化优势,结合农业的季节性特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农业观光旅游等,为家庭生计构筑多元保障体系。这些行动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效用为目标,也受精神利益的驱动,以价值为目标,并指向他人行为的行动,具有社会生活的复杂面向,是一种社会经济行动^[23]。农业社会学强调,农业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了确保生活的休闲节奏,农民可以减少劳动,留出闲暇的时间不以痛苦为代价获得快感的消遣经济^[24]。因此,农民视角中的产业发展既有财富的追求,也有生计考量,更有应对资本的弱者的武器,多业并举是其表象,诸多面向背后最根本的是源于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25],即农民的社会经济行动是为了维持家庭社会生活的完整。产业发展为农民家庭及其社会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家庭及其社会生活则赋予农民发展产业的动力。

农业产业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关联农民、家庭的整体性问题,不但存在后置环节的产业-市场机制,还存在前置环节的农民-产业的契合性问题。农业产业发展的实质是农作物乃至其他农业生命体的市场化过程。以要素赋能农民、健全产业链虽然可以解决后置环节的农民-市场的匹配问题,但忽略了农民与作物的亲和性。换言之,农民选择何种作物作为产业发展载体,有其整体考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区域,即使是政策条件、技术支持等相似的两种经济作物,在落地过程中也有着不同的产业后果。有些作物政策支持力度强、市场需求大、利润可观,却未能受到农民的青睐;有些作物没有标准化的生产流程,甚至有些低效益,却被农民接纳并成为其生计体系的一部分。现有研究对作物、产业、农民社会生活之间的亲和机制作用的解释并不清晰,本文试图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对此进行分析。

二、农业社会学的作物特性机制

政府、市场、地方传统与作物本身的特性共同塑造了农业产业的不同发展轨迹^[26-27]。农业产业间的多样化协调机制及其背后不同的作物特性和社会文化观念,使不同农业产业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发展差异^[28-29]。尤其是地方特色农作物的产业化过程往往与地方的劳动力配置、兼业化乃至家庭经济分工紧密结合,形成具有合理性的“经济生态系统”^[30]。农业社会学提出作物、产业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试图分析不同作物的生物特性与乡村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互构与映照,致力于证明农业产业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在自然、市场与社会文化的安排上具有

内在本质差异,存在多种起源和多元性质差别^[31]。我们应看到作物本身的独特性,不能对作物加以标签化处理和静态比较,还应从历史的动态视角,尤其注重地区内部的社会生活安排与作物产业发展之间的复杂面向,洞悉促进或制约农业变革的社会力量,因为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与既有社会文化传统的适配问题,将陷入扎根乡土的困境^[32]。

本文所指的作物-产业关联机制意为作物与农民社会生活之间的互构而产生的作物产业样态、作物与农民之间形成的关系互动模式,尤其是作物特性影响甚至决定了产业具有特定的市场样态。作物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影响产业的形成过程,甚至某些自然特性与当地农民的社会生活紧密关联互构,这些生命、生活特征在与市场经济接触时,不可避免地进入市场经济活动。市场机制为顺利实现经济交换,不得不考虑作物、产业自身的特性,从而与作物形成一定的迂回特征^[33]。作物、产业、社会在复杂的互动中创生出独特的“作物-产业-社会”机制。正是由于不同作物有着不同的社会-市场机制,作物特性与人们社会生活结合的多种可能性,使作物在产业化过程中呈现出相当的异质性而非同构性特征。农业社会学通过突出农业的两重性,强调注重作物自然性与社会性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34-35],从而桥接起作物特性、产业特性、社会文化生活、市场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致力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作物关联的产业易于实现市场化并被农民接受,有些则相反。这一视角既观察作物如何作用于产业发展,也关注当地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约束条件塑造经济活动的过程,即讨论作物特性与当地社会生活如何交织在一起对农业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分析概念及问题:作物特性机制,即作物的属性如何诱导出社会生活的状态,两者又如何塑造出同一地区的产业发展差异,形成农民对于发展产业的不同理解;产业特性机制,即作物特性与社会生活如何影响产业的形成过程,进而创造出地区特定的产业样态;社会生活机制,即不同的社会生活安排如何顺应作物的习性,进而影响产业的特性,这样的逻辑进路又形成了怎样的作物与产业景观。本文讨论作物特性与产业特性之间的关联机制,尤其考察作物、产业的人口吸纳能力、社会亲和力,作物的特性带来的农民在城乡之间的社会位置,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乡土的结合状态,并重新认识农业产业发展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双重意涵。

三、研究方案与田野点概况

2019年8—10月、2020年8—9月,笔者先后在贡县^①进行了4次实地调查,访谈县农业农村局及扶贫办负责干部5人、乡镇负责干部10人、农户35人,共计50人,跨5乡(镇)8个行政村。贡县为南方丘陵山区农业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光热水资源充足,土壤肥沃,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优越。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贡县总耕地面积约39万亩,其中白莲约8万亩、水稻约25万亩、烟叶约2万亩、蔬菜大棚约4万亩。

白莲是贡县的传统经济作物,据县志记载,清宣统年间政府大规模引进白莲,成为农民主要的经济作物^②。20世纪50年代因“以粮为纲”而缩减,80年代初政府与民间分别从外地引进白莲,种植范围扩展至各乡镇,重新成为富农产业。1985年,贡县水稻面积为27万亩,白莲达3万亩,烟叶约1万亩,至此,贡县“烟、莲、稻”基本作物格局形成并维持30余年。近年来,贡县白莲的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9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的30%,覆盖全县95%的农户^③。贡县白莲种植占全省总种植面积的33%,年产鲜莲2万余吨,占全省总产量的25%,为全国三大籽莲主产区之一。贡县每年投入白莲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达300万元,对从事白莲种植的农户给予

① 本文依据学术惯例,对文中涉及的所有地名、人名和公司名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② 材料及数据来源于县志,由笔者整理而得。

③ 资料、数据来源于贡县农业农村局。

200元/亩的补贴,以及60元/亩的农业保险。同时,将全县划为三个片区,建立白莲指导员制度,每个片区配备5名“莲技员”,推广莲藕腐败病防控、标准化栽培以及配方施肥等技术^①。此外,政府不断引入先进藕种,如“建选17号”“建选31号”“建选35号”“太空36号”等良种。

白莲产品有莲子、莲花、莲藕、莲心等。目前贡县已初步形成五个交易集散地,有五大企业及两个区域性合作社负责白莲的产品加工、交易。白莲系列产品远销全国及东南亚,产值达3亿元。近年来,贡县干莲价格稳定在30元/斤左右,按亩均产190斤计算,每亩白莲产值约5700元,剔除种藕、肥料、农药等投入1200元,每亩莲田纯收入4500元,是种植水稻的3~4倍。白莲因种植技术成熟、市场价格稳定、生产成本逐年走低等原因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

自精准扶贫以来,贡县探索出“3+X”的产业扶贫模式,其中,“3”指吸纳农户参与“烟、莲、菜”模式增收,“X”指选择发展脐橙、油茶、山地鸡等特色种养产业。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将原有的“烟、莲、稻”调整为“烟、莲、菜”新结构,即引进企业流转土地建设大棚,缩减水稻、烟叶、白莲的种植比例,扩大蔬菜种植面积,以期通过蔬菜产业带动农民脱贫致富。2017—2021年,贡县共建成蔬菜基地40个,总面积约4万亩,主要种植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油菜等蔬菜。

县政府为大棚蔬菜种植提供多项优于白莲的优惠政策,如承诺在高标准农田改造实现“三通一平”的基础上,按照单体大棚1万元/亩、钢架连体大棚3万元/亩、冬暖式大棚5万元/亩的标准予以奖补。同时,通过“蔬菜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推广“433”产业扶贫模式,即钢架大棚40%由企业示范经营、30%返租给种植能手、30%无偿租给贫困户种植,并免费发放秧苗、提供技术与保底收购服务,以带动农户增产增收。农民流转土地后,若按务工、反租倒包、股金分红等综合测算,其总收入要高于种植白莲的收入,如农民从事大棚种植每亩年均预计可增收2万~3万元,参与务工则每月可收入3000元。为保障农民权益,政府从中间做担保,农民以村集体为单位与企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租金前3年为500元/亩,每3年递增10%,合同期为7年,企业每年提前将租金支付给村集体及各农户。

本文考察的田野点为贡县的朱村和陈村,两村均属该县蔬菜大棚重点建设村。朱村距县城13公里,共9个村民小组,435户2030人,耕地面积813亩,农作物主要为水稻、烟叶、白莲、油菜等。2018年8月,县政府引进山东富农公司流转该村220亩耕地建设高架大棚,主要种植茄子、辣椒、西红柿等。2018—2020年,先后约有20户村民参与大棚种植,但目前仅剩3户还在坚持。陈村距县城15公里,共1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694户2226人,耕地面积约2257亩,主要作物为烟叶、白莲、水稻、翻秋花生等。2018年11月,县政府引进江西新粮公司流转该村1500亩耕地搭建高架连体大棚,主要种植茄子、辣椒、豆角、黄瓜等,该公司还连带流转邻村耕地,共2000亩,并试图建成智能化蔬菜基地。两村都有相当规模的山间平地、完整的“烟、莲、稻”与其他辅助作物的种植结构,且在产业扶贫中均经历作物结构的快速转换。其中,陈村在2018年仅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1500亩的土地流转,并在2019年12月完成1500亩的高架大棚建设。2018—2020年,村里约有30户农民参与大棚种植,但目前仅剩5户还在坚持。

经过4年的推广,农民种菜的积极性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2021年,县政府在两个村做了一项关于蔬菜大棚种植意愿的调查,真正有兴趣种菜的农民不到10%^②。2022年3月,陈村甚至将闲置的700余亩大棚改作水稻育秧。为了不让大棚撂荒,县政府不得不动员在外务工人员回乡种菜。在无偿提供大棚、种苗、技术指导等前提下,为何农民对大棚蔬菜种植持消极态度?本文选取贡县主要种植的茄果类蔬菜与白莲作比较分析,分别从资本投入、劳动力需求、技术管理、市场过程、社会生活等维度阐述作物特性是如何关涉不同的产业状态、进而通连不同的农民

① 资料、数据来源于贡县农业农村局访谈。

② 调查资料及数据来源于贡县农业农村局。

社会生活的,以揭示农民与作物存在的亲和性如何导致产业发展差异。

四、从作物到产业:“挑剔”的菜与“不挑剔”的莲

(一)“挑剔”的菜

1.人造的大棚

大棚蔬菜的“挑剔性”主要体现在对自然条件、资本、技术、劳动力、市场的协作和配合的高要求上。就生长环境而言,贡县所处的纬度、丰沛的降水、积温和肥沃的土壤是多数农作物生长的理想条件,但贡县地处罗霄山脉片区,平坦开阔的地形较少。大棚蔬菜的生产需营造一种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封闭空间,并要求地形平坦、背风向阳、排水便利,要达到这些条件,需一定的前期投入。贡县重点推广双层双模钢架连体大棚,这种大棚宽 6~8 米,长 30~50 米,棚间距 2 米左右,加上配套的卷帘卷膜、喷灌、电控等设备,单个连体大棚的投资每亩 6 万~8 万元。显然这样高成本的大棚,如果前期的固定设施没有政府投入,即便是企业也不敢轻易涉足,更不用说普通农民。为了能使大棚蔬菜顺利落地,县政府采取了两套办法:借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实现耕地连片与“三通一平”;积极引进企业投资建设钢架连体大棚,并给予每亩大棚建设成本 50% 的补贴,企业建成大棚后,需帮扶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如优先雇佣本地贫困户务工,对于有种植意愿的农户,免费提供大棚。事实上,除前期的基础设施投入外,蔬菜大棚后期的水、电、种苗、农药、化肥以及雇工成本对于普通农户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茄子为例,单季茄子每亩大棚的投入约 8000 元,几乎相当于 2 亩高产白莲的收益。

2018 年春节务工返乡的 43 岁陈村村民陈桂林觉得大棚蔬菜有市场前景,便和妻子商议决定放弃外出务工,租种 4 个连体大棚,主要种植茄子、辣椒等。陈桂林不是贫困户,原本需向企业每年支付 4 万元租金,但政府有意通过蔬菜企业培育本地菜农,便为其免去了一半租金。陈桂林同时从企业获得种苗、技术及生物农药等帮助。但在种植过程中,陈桂林发现大棚蔬菜并不像自家菜园子种菜那样简单。在种辣椒时,每隔 5 天就得喷一次农药,而且还要按比例配制,使用的农药还需与企业保持一致,不然药物作用的差异会引来其他大棚的害虫。因打药次数过于频繁,使用的农药成本过高,加上种苗、化肥、农膜、灌溉、雇工的投入,虽产量提高,但因规模达不到蔬菜企业的水平,即使走企业的渠道代为销售也是低价出售。2019 年底,扣除成本,陈桂林每亩大棚仅 1 万元收益。陈桂林的话说:“这都是辛苦钱,还不如我俩外出打工。”2020 年底,随着脱贫攻坚结束,大棚的各项补贴也随之减少,租棚成本也随之提高,陈桂林夫妇觉得不划算,就放弃了大棚蔬菜经营,重新外出务工。

2.复杂的技术

大棚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主要通过对温度、湿度、光热、水肥的调整控制作物的生长过程,规避自然因素对蔬菜带来不利的影响,这需要经营者有一定的技术素养与生产管理能力。对于温度和湿度的把控,可通过安装通风和供暖设备实现,但如何辨别蔬菜生长过程中何时需要增湿、增温,则依赖个人经验与技术娴熟度。

以茄子为例,茄子喜高温,定植阶段需将棚温控制在白天 25~30℃,夜间 15~20℃,否则茄子将生长缓慢。茄子喜阳,需充足的光照,才能高产。农民若想在反季节的冬天上市茄子,需在白天打开遮阳布,晚上及时关闭,同时运转暖风机控制室温。茄子喜水,挂果后的灌溉频率是平常的数倍,但又需要控制好棚内湿度,若灌溉较多,土壤和空气湿度过大,则易引起根系和叶面沤水腐烂。茄子的生长周期一般为 2—3 个月,如 2 月定植,则 4—5 月采收;6 月定植,则 8—9 月采收。茄子与烟叶、马铃薯同属茄科,不能形成轮作。由于贡县农民普遍种植烟叶、马铃薯等同科类作物,在种植茄子时需对土壤进行消毒,并从豆类和葱类作物中取 15 厘米的表层土,以

使茄子幼苗在定植时生长良好。为了高产,在开花坐果期,种植户需清除根茄以下的多余侧枝,摘去生病发黄老化的枝叶和畸形生病的果子,以保持株群通风透光,防止消耗养分。加之日常的水肥、光照和病虫害管理,如茄子杀虫药就有十来种,需按照比例定量混合配制,这样精细的技术密集的生产管理过程要求种植户必须投入相当的时间、精力。

3. 雇佣的劳力

大棚最耗费成本的还是田间管理,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农民坦言道:“病虫害最麻烦,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会出现。”对于不可预期的病虫害,农户多以预防为主,如预先做土壤净化处理。陈贵林说:“我们这里湿热大,菜容易害霜霉病,得在大棚里装排风扇通风。没有排风扇,菜容易死。”“大棚的投资大,设备和人手跟不上,很容易在高温和低温时期形成冻害和热害。”解决的途径只能是购置设备、增添人手。

雇不到合适的人手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由于贡县约85%的年轻人都外出在沿海一带务工,留守在村的劳动力,无论是年龄、技能还是身体条件,远达不到大棚蔬菜高强度快节奏的要求。棚内温度高、湿度大,植株密度大,并不适宜60岁上下的老年人劳作。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每逢果蔬定植、采摘或突遇灾害时节,用工量激增,可谓是“活多人少”。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当地农户,都在雇工上下了不少功夫。企业因规模大,用工量是普通农户的数倍,往往愿意支付高工资雇工,如男工100元/天,女工90元/天,但为节省成本,一般也不轻易使用男工。陈村新粮公司通常每10个棚由1个男工、7个女工负责,年龄上男工50~70岁、女工45~65岁,平均每天工作9小时,忙时12小时,且不包餐食。2018—2019年,企业还能雇到80~100人,但2020年后即使工价涨到男工150元/天、女工120元/天,忙时加钱包餐食也很难雇到人。企业负责人林福慧说:“这地方常年气温高,棚里就更热,年龄大的有高血压的身体受不了,说化肥、农药味吸多了头晕。”朱村驻村干部黄锦春说:“农村的青壮年还是去外面的多,企业经常缺工,有的嫌工资低管得严,有的嫌棚里透不过气。老板想了很多办法,雇了年轻人,但水平又跟不上。茄子要按标准修剪,他们舍不得剪,觉得伤苗子。传统观念跟科学种植冲突,会种菜也不会种菜。”因企业工价抬升,普通种植户只能寻求跨亲属网络支援,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如单季茄子每亩大棚的用工成本约3000元,种植户陈科礼说:“种大棚要自己吃苦才能赚钱。他们有钱雇人,我们小老百姓宁可黄掉也不雇人。”

4. 单一的茬口与错位的市场

因高成本投入,大棚蔬菜无法给种植户试错的机会,农民只能选择市面上最受欢迎的蔬菜种植,如此“随大流”的单一种植就成了普遍选择,所有的生产过程也就日益标准化。“茬口”是种植户占领市场的唯一机会,通常的做法就是赶在市场某一蔬菜即将匮乏的时段,提前预判并进行育苗、定植、采收并及时入市。由于作物之间存在“茬口特性”,需要掌握前茬作物对土壤及后茬作物的影响,合理安排轮作换茬。如辣椒和茄子同属茄科作物,不能轮作。农民只有记清楚这块田上一茬作物是什么,才能安排下一茬作物以避免“重茬”。

其实作物特性带来的难题对农民而言只要花费精力也并非不能克服,但大棚蔬菜的具体困境在于市场,因为“种得多不知道往哪里卖”。当大面积种植作物遇到市场价格暴跌时,就连企业也难逃“血本无归”的命运。为此,政府将蔬菜产业的发展定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试图连接新的消费市场,因而在发展蔬菜产业时,主要参考的是粤港澳的市场需求,但真正能达到供粤港澳准入的只有几个蔬菜企业。政府原本希望借助企业的力量衔接农户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但因种植技术的差距,农户种出来的蔬菜大多达不到标准。农民只能自找市场,如直接拉菜到县城菜市场零售,但由于是临时摆摊,在早八点城管上班前他们就得收摊回家。虽然零售的价格稍高一些,但量少,且还需耗费一个劳动力。除零售外,农民也将菜批发给学校等机关单位以及餐饮酒店企业等,这样虽可提高销量,但价格较低。通过机关单位订购也需一定的社会

关系,这些关系资源并非一般农民所能具备。脱贫攻坚时期,政府曾动员机关单位内购农民的蔬菜,但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内购市场也随之消失。受贡县本地的饮食结构限制,这些农民只能结合本地市场种植一些地方性蔬菜,如本地人喜爱紫色长茄子,而这并非外部市场受欢迎的圆茄子。像杏瓜、红薯和芋头都是本地人做丸子、水饺常用的食材,但这些蔬菜品种露天也可种植,是传统种植户甚至是各家户菜园子里常有的作物品种,因此,大棚种植转向本地市场并不能取得明显的市场优势。

由于本地品种销售区域受限,市场有限的消费能力只能容纳不多的种植户。仅存的大棚蔬菜农户,并非说明大棚蔬菜适宜经营,而是因为他们较年轻,能跟上大棚蔬菜的节奏,同时,蔬菜企业将市场瞄向粤港澳大湾区,才给予这部分农户生存空间。对接本地市场、种植本地品种,在找到市场的同时,也制造了众多的本地小散户竞争对手。这样一来,入手大棚的农民利润空间更加有限,大棚能给他们带来的唯一优势就是反季节种植,尤其是冬季,当露天种植失去自然优势时,才是他们真正的茬口,这也使本该休息的“闲季”成了“忙季”。由于蔬菜易腐烂和不耐储存,为保证菜品的时鲜性,农民必须采摘后尽快送到市场交易。而蔬菜市场的价格瞬息万变,同一品种一天之内可能有不同的价格。农民形容“种大棚就像赌博,长得好,不一定卖得好,卖得好不一定赚。连续种,有一年赚到就很了不起了,种大棚就看谁能坚持下去”。种植本地品种,依赖本地市场,意味着这批进军大棚的农民已逐渐失去了对接外部广阔市场的能力。本地市场对于品质的要求远低于外部市场,因而农民也不会在种植管理上进行改进。抢先占据市场的首批农民能尝到甜头,而后进入的农民则难以再开拓新空间。

5. 急聚的“病”与被支配的生活

市场对蔬菜口感、品质及外观的标准化要求强化了大棚蔬菜的单一种植,单一种植又进一步增加了作物病虫害的危险。由于贡县的蔬菜大棚多集中在有限的平坦耕地上,不利于种植户各自独立经营。因“每个人的脾气、习性都不一样”,种植户对作物的茬口安排也不甚相同,过于相邻的密集种植则带来茬口感染。2020年4月,陈村的陈科礼和陈成仁一起种番茄,俩人的大棚相邻。6月,陈科礼觉得番茄的市场价格低,加上连续害病,便把所有的番茄用机器打掉。陈成仁的番茄由于提前做了预防,没有出现病害问题。但由于陈科礼没做虫害预防,他把番茄打掉后,棚里的害虫就跑到陈成仁的棚里,为此陈成仁又不得不重新打药。此外,由于农户跟企业的大棚相邻,企业用的是生物农药,可轻易赶走害虫,农户用不了成本较高的生物农药,于是从企业大棚里赶出来的害虫就到跑到农户的棚里。

除病害传染外,连续高强度的种植也带来新的病虫害。朱村38岁的农民朱占杰说:“我们田里出现了很多老一辈人都不知道的病。连白莲都受影响,种下去就枯死掉。这几年种大棚,一年到头不停地种,越种越多病,越种越多虫。”原本农民依靠各种作物的轮作、套作,可利用作物间的相生相克有效防治一些病,如当地农民曾使用种豆角的方法来抵御作物的白粉病。也有农民认为“现在的有机肥不像过去的农家粪没有那么多盐、激素。买来的鸡粪、猪粪堆肥以后,盐分大,靠换茬种也很难吸收掉”。可见,密集单一种植的大棚蔬菜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当地生态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尽管大棚蔬菜的收益不低,但很辛苦,一旦进入整个生产流程,种植户生活的中心就围绕蔬菜运转起来。种植户日常的生活状态变成“上午入棚管理、下午收菜整理上车、晚上一两点将蔬菜送到县里,早上回来睡觉。”朱占杰说:“干了大棚以后,起早贪黑,一年四季几乎都在大棚里边,照顾不到小孩,连做饭、小孩上下学、生病送医院都得靠爸妈。早上三四点就得起床,晚上二点可能还在大棚里。把菜采好还要整理装车送客户,剩下卖不完的,再去菜市场零售,连家也顾不上,弄得不像人样。”就不能重茬、恢复地力的客观规律而言,通常每年需3—4个月的休棚期,但为了尽可能获取收益,无论是企业还是农户都略过休棚期,如若棚内病虫害过于严重,则采取

错位轮换休棚的办法,以保证持续的蔬菜产出。如此一来,生产者一年四季都被作物带着往前赶。贡县属客家人聚居地,尤为重视家族团结与社会事务参与。如涉及家族内部的建房、红白事等都会在祠堂内摆酒团聚以强化内部关系。大棚蔬菜的快节奏高密集劳作,给农民参与宗族的社会事务带来了困境,以至于农民朱占杰说:“回村挣钱不就是顾家嘛,在家种棚还顾不了家,跟出去打工没两样。村里的事也没法去,人家都说我种大棚后,都不认识我了。”可见大棚蔬菜的生物时间与农民的社会时间存在一定冲突。

(二)“不挑剔”的莲

1.天然的“大棚”

相较于大棚蔬菜,白莲属于水生作物,需要相对开阔的水域面积作为生长空间,贡县温热湿润多水的地理环境仿佛天然地为白莲形成了一个生长的“大棚”,无须再投入基础设施,营造新的生长环境。此外,种植白莲投入的成本较低,如果没有流转费用,预计总成本为 1200 元/亩。在白莲的所有生产投入中,若引进新品种种苗最贵,约 400 元/亩,通常白莲的种苗可免费从同村的亲属那里获得,同一个村或者附近村,只要品种好,打个招呼就可去田里挖芽。莲田的水由政府修建的引水工程统一供应,不用担心水源问题。如果家里劳动力与种植规模不相配,可选择雇工加工白莲,或购置 4000 元/台的剥壳脱皮机。由于干莲市场价格高,农民多出售干莲,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烘干机,烘干机分为电烘干机和煤炉烘干机,平均价格约 1200 元。无论是固定支出,还是非固定支出,白莲的投入都远低于大棚蔬菜。

2.简便的技术

白莲在种植、采收乃至加工环节并不需要大棚蔬菜那样复杂的技术。如表 1 所示,首先是藕种选择,农民一般选扁平粗壮、无虫斑、顶芽完整的子藕做种,并于每年 4 月初栽种。定植过程不像大棚蔬菜复杂,只需将顶芽向上,倾斜埋入,每亩播种约 150~220 芽。由于易播种、株距大,夫妻俩一天可播种 2~3 亩白莲。

表 1 白莲的田间管理过程

时间	4 月	5 月	5 月	5 月	7 月	5—9 月	10—11 月
田间管理	栽植	中耕锄草	追肥调水	病虫害防治	采花、采叶	采莲子	采莲藕

白莲的田间管理也较简单。除需在前两个月苗弱时锄草外,60 岁的老人也能管五六亩。白莲的水肥管理也不像大棚蔬菜那样频繁,以农家有机肥做底肥,每亩地施用 1500~2000 斤。白莲出苗、开花、出子时可适当追施复合肥。莲子采收完毕,灌浅水确保莲藕安全越冬即可。

白莲的生长速度较快,不出一个月便可长满整口莲田,5—6 月,莲花盛开之际,可适当采摘出售。6 月中旬,当莲子表面呈茶褐色斑块时,意味着莲子可采收了,这也是农民相对繁忙的季节。白莲采收以 3~5 米为一行,沿固定的线路按行进行。在莲子采收过程中,农民将莲叶摘除晒干出售,这样既减少田间荫蔽为其他套种作物留出空间,亦可作为采摘记号,减少重复劳动。

莲子采摘一般为早上 8 点前或下午 5 点后。采回来的鲜莲子需在 12 小时内完成脱粒、剥壳、去莲衣、通芯等加工环节,有条件的农户还可进行速冻、包装、冷藏后待价而沽。干莲的过程较为复杂,需将通芯莲子用清水漂洗干净,放入烘筛中烘干,烘好的莲子退热后包装,即可进入超市等卖场。

白莲的生长期较长,采收莲子又分不同阶段,因此采收莲子的时间要根据莲的这一特性来掌握。具体而言,白莲在始花期生长需 40 天,在盛花期需 35 天,在终花期需 30 天,每年从 6 月底 7 月初开始至 9 月底 10 月初陆续收获结束。如果采收过早,颗粒不饱满,影响质量与产量,因此,莲子的采收遵循成熟一蓬采收一蓬的规律,具有间歇性特点。分期、分批采摘是与白莲的作物特性相适应的,也与农户生产生活安排的习性相契合,这不仅为莲子的加工带来了方便,还为农户的兼业化与作物轮作、套作提供了可能。

3.家庭为劳动力

在莲子成熟前,农民只需每天清晨和傍晚在莲田中进行常规的田间管理,其他时间则兼业,这使得农民种植白莲形成半工半农的劳作模式。白莲有 5 个生长周期,约 210 天。由于莲子和莲藕并不在一个时间段成熟,这给当地村民的生活节奏带来了社会时间安排的丰富性。朱村 47 岁的农民朱祥平清晨 5~8 点采莲子,在田埂就可直接卖给莲贩子,9 点回家吃完早饭,便与妻子去蔬菜企业或者镇上的工地打零工,傍晚 6 点零工结束后还可再去采 1~2 亩莲子。

莲子加工虽有脱粒、去壳、褪衣、通芯、烘烤等工序,但对劳动力并无太大区分,可调动各年龄段的家庭成员参与。在入户调研中,经常发现一个家庭上至 80 岁老人下至 6 岁孩童都会参与鲜莲的去壳、去皮、通心的加工环节,可以说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型的莲子作坊。男女老少围坐一圈,有的剥莲蓬,有的割莲壳,有的去莲衣,还有的通莲芯。平均每人每天可完成 20 斤莲子的加工,比较熟练的 1 小时就可加工 10 斤左右。有时忙不过来,邻居之间也常发生换工、帮工的现象,甚至住在县城的亲戚也会赶回来帮忙。规模性的种莲大户则选择雇工,这也为村里的老年农民提供了收入渠道。加工 1 斤莲子约 1.2 元,村里无地少地的老人,每天靠加工莲子可获收入 20~30 元。儿童、妇女、老人的参与使得莲子加工具有家庭经营的特性。白莲简便的加工技术契合了农村留守劳动力现状和家庭分工的需要,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4.轮作与套种

“白莲浑身都是宝”,除莲子外,莲叶、莲花、莲藕都可作商品出售,因此,白莲的产品形式多样,具有复合型。农民既可选择售卖鲜莲,也可选择加工成干莲出售,这为农民留有一定的选择空间。若鲜莲的价格高,则直接出售鲜莲,若干莲的价格高,则以干莲出售。贡县亩均产干莲子约 190 斤,按照干莲 28 元/斤的价格计算,扣除成本,可为农民带来约 4500 元/亩的纯收入。

除莲子外,莲叶一直是药材市场乃至餐饮业的重要辅料,贡县莲叶市场价格每斤约 5 元,每亩莲田能采收干莲叶 120 斤,收入约 600 元。莲藕虽不是种植白莲的主要目的,但也是当地人的重要食材。每年 9 月莲子采收完以后,农民采收部分食用藕出售,每亩收入约 400 元。当然对莲藕,农民主要是自己留作种苗用,但也有经纪人来村里收购莲种,按每捆 20 芽、0.5 元一芽的价格收购。莲心具有清热功效,由于产量少也最贵,1 斤莲心的价格约 60 元。而去衣的莲壳可做有机肥回收或做食用菌的培养基。如表 2 所示,综合折算莲子、莲花、莲藕、莲心等,一亩白莲可给农民带来约 8000 元收益。

表 2 每亩白莲的综合收益

种类	莲花	干莲	莲藕	莲叶	莲心
亩均产	5000 朵①	190 斤	4000 斤	120 斤	20 斤
价格	0.8 元/朵	28 元/斤	1.2 元/斤	5 元/斤	60 元/斤
收益	300 元	5320 元	400 元	600 元	1200 元

农业社会学强调农民在引进新作物时,需考虑其与现有作物的轮作特性^[36]。历史上贡县形成烟、莲、稻附带其他作物的轮作模式有其内在合理性。作物的轮作尤其强调前茬作物的特性,农民以烟叶为白莲的前茬作物,水稻作后茬作物。这是因烟叶、白莲、水稻之间并无同源性病虫害,且栽种烟叶时的肥料残留可用于助力白莲、水稻生长。白莲、水稻的秸秆腐殖化系数较高,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和耕性的改良^[37],为烟叶的生长创造有利条件。水作的莲、稻与旱作的烟轮作,水旱环境交替可互相克制许多病虫害,三者轮作具有互补作用。

除轮作外,莲还可与稻套作,每年 4 月初植莲后间隔一个月在莲田内套栽晚稻。晚稻套栽

① 虽然莲花、莲藕亩均产分别为 5000 朵、4000 斤,但通常为保证莲子的收成以及下一季的白莲复茬,当地农民多在有市场时少量售卖莲花和莲藕。

在莲田内,半荫蔽的光热条件使其返青快长势旺,又因前后作物病虫害寄主不同,可减轻水稻病虫害发生率。围绕白莲,农民还衍生出“莲-鱼”“莲-鸭”“莲-空心菜”套种。在白莲生长的中后期,不再繁殖新的莲杆,农民在莲田里养鱼、种植空心菜等。白莲对农田水体、土壤中的氮、磷营养物质及土壤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有吸收转化能力^[38],起到净化土壤和水体的作用,对养鱼、养鸭等产生有益作用,白莲的枯枝落叶和鱼、鸭的排泄物等排入农田,可提高土壤肥力。

大棚普遍种植的茄科类作物如茄子、辣椒、西红柿以及葫芦科的西瓜、冬瓜等都因作物科属与烟、白莲相同或相近,存在同源性病虫害,且大棚多为旱作,也难与烟草、白莲、水稻形成轮作。对于作物选择而言,农民不是种植一种乃是种植多种。作物的复杂安排,可把自然乃至市场风险化解在不同的结构搭配中。单一的作物没有应用自然规律,多元的栽培却是更为稳定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39]。

5. 社会化服务

白莲拥有较为成熟的交易体系,农民种植白莲并不担心市场问题。贡县本就有全省最大的白莲交易市场。在白莲销售上,选择自己出售还是卖给白莲经纪人,主要取决于有无时间或交通工具去县城交易。如若县城白莲交易市场价格与乡镇并无太大悬殊,又需花费时间精力,农民则倾向于经纪人上门收购或卖给村里从事白莲加工的农户。

贡县存在一个规模150~200人懂经营、善管理的白莲经纪人群体。经纪人上门收购时,农民通过与经纪人的信息交流,心中已有一个价位,对经纪人也会“货比三家”。同时,经纪人也会根据白莲的质量给出不同的价格。经纪人不但在县内活跃在乡间及白莲交易市场,还在主要大城市建立了固定的销售网络,所以贡县白莲基本没有出现产品滞销现象。

实际上白莲产业的发展壮大也源于从政府到民间形成的一套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抵御市场风险,农民自发组建农民协会等。如连接莲农和市场的白莲协会,由协会成员分片联结农户,与莲农签订收购订单,对莲农进行免费技术培训,严格限定农药、化肥的使用,并对收购的鲜莲进行统一技术处理、包装、冷藏、储运,并派驻专人在广东、福建各大中城市,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除协会外,有些乡镇还成立了白莲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提供种苗、农药、肥料、机械、技术、加工等社会化服务。

五、从产业到社会生活:制度性的菜与弥散性的莲

(一) 产业特性:制度性产业与弥散性产业

杨庆堃先生在分析中国宗教时,提出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两大类型。其中,前者是指有神学自己的体系、仪式、组织,独立于其他社会世俗组织之外,自成一种社会制度,有基本的观念和结构体系;后者是指其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成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40]17-34}。杨先生对中国宗教的这两大类型学分析,生动刻画了中国的宗教与民众社会生活之间的实质性功能与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制度性与弥散性本身具有类型学与方法论的意味,其概念在特殊性中有普遍性意涵,可以用来分析作物、产业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契合性。

1. 制度性的菜

质言之,大棚蔬菜是在作物生长、产品流通环节进行标准化控制的,以规避农业自然性带来的季节周期、流通成本与生产管理分散的影响。大棚蔬菜具有较强的制度性:第一,就作物特性而言,大棚蔬菜具有单一种植、田间管理标准化等制度特性。作物没有显著的地域性区分,只要有大棚,作物放在哪里都可生产,因此受自然因素影响小,受资本、技术影响大。作物的生长是在人为营造且相对隔绝密闭的大棚内进行的,可规避一定的自然因素影响,能实现反季节生长。

作物生长过程满足了所需的水肥条件,加快了生长速度,因而作物产出高,品质优良。第二,就产业特性而言,大棚蔬菜属资本密集、技术操作标准、劳动力素质要求高且较为组织化的生产过程。经营主体看似控制了生产过程,实则被作物的市场机制“捆”着往前走。为了实现反季节、赶茬口快速生产上市,经营主体被支配在作物的生产管理、技术操作流程上,为作物提供专门的种苗、化肥、农药以及特定可控制的大棚设施生长环境。除部分用工外,其他生产环节都可与家庭乃至村落社会分离开来,也就难以真正与经营主体的社会生活实现融合。第三,就市场过程而言,因产品的市场需求导向强,加上反季节生产、高收益特征,具有高风险性。产品针对的是需求量巨大的城市市场而非农村市场,但因时鲜性,不耐存储,需及时付诸市场,产品成熟期及时交易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关键,这样带来市场交易的艰难一跃。第四,就社会亲和性而言,蔬菜大棚产业是依附于整个市场制度的。大棚蔬菜产业尤如一台“跑步机”,市场和资本是其背后的主动力,经营主体一旦上了跑步机,便只能被其裹挟前进,停止投入或者稍有慢步就容易被甩出,成为竞争中的牺牲品,而能够跟上跑步机节奏的农民往往也得牺牲其他社会时间,成为被大棚蔬菜产业支配的“傀儡”。大棚蔬菜虽然有生长期,但快速市场的强大吸力,让经营主体没有空闲的时刻。如若农民涉足大棚蔬菜产业,则一年四季都被大棚蔬菜所控制,无法抽身而出甚至被从其他社会活动的空间中剥离开来。

其实蔬菜本身并不“挑剔”,但当蔬菜演变为大棚蔬菜的产业形态之时就有了对从业者的区分,由于作物的挑剔性,从业者若想盈利,就必须压缩用工量,这也削弱了蔬菜的溢出带动效应。因技术门槛,蔬菜大棚像是一堵“墙”将棚内的人与棚外的人区分开来,能够拥抱大棚蔬菜的农民因市场而获得足够的财富,不能适应大棚蔬菜的农民只能成为蔬菜企业的雇佣工人或者选择外出务工,因而也只能成为极少数农民可以涉足的产业类型,这也意味着大棚蔬菜产业很难产生有效的带动作用。

2. 弥散性的莲

诸如白莲这样的弥散性作物,则与农民的生计体系以及村落的日常生活融合较为紧密。首先,就作物特性而言,白莲的生长周期较长且具有间歇性,须在适宜的季节播种、采收,延误了农时就需等下一季。白莲的种苗可凭借经验留种或者向邻居“借种”,但白莲的生长过程不像蔬菜大棚高强度依赖茬口市场,生长环节可为农民所掌控。农民可以在白莲生长的间歇安排其他社会活动,也可将其他作物、家禽与白莲搭配轮作、套种乃至种养结合,在作物家禽特性的相互作用中化解自然、市场风险。

其次,就产业特性而言,白莲不需考虑茬口市场,不需过于制度化或规范化的技术操作流程,也不用高强度快节奏的水肥管理。白莲技术为村民所共享,莲子不存在强烈的排他性竞争。此外,白莲的种植、采收和加工过程对劳动力的区分不强,因其生长水域、空间、湿度、温度的综合性要求,即使资本强行进入,也难以集中管理控制。加上白莲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弥散在农民的社会活动中,难以将两者彻底分离,因此带来产业也具有弥散性特点。它无法像蔬菜大棚那样真正地将农民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一个较为独立性、制度性的生产体系,也无法真正反客为主、支配农民的生活,反而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一部分。

再次,就市场过程而言,由于没有茬口市场,白莲不存在忽高忽低的价格涨幅,而是稳定在一定的价格区间。白莲多由小农户以家庭为单位生产,本土的经纪人网络起到重要的市场对接作用。经纪人如果没有好声望,故意压低价格也难以生存下来。白莲可进入市场交易的部分较多元,莲藕、莲子、莲叶、莲花、莲秆都可作为商品出售,使得白莲的综合经济价值大大提高。

最后,就社会亲和性而言,农民首先以家庭生活为中心,而后围绕生活安排其余的生产活动。白莲能够存在于农民的作物结构中的重要原因,除其具有经济功能外,更重要的在于它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并未产生冲突,也没有异化农民的生活,反而让农民在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之

间取得了平衡。白莲的作物、产业特性给予农民自由的社会时间安排与稳定效益,而农民在白莲作物特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复杂的经纪人网络、市场价格体系乃至社会交往方式。白莲与农民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互构,离开了家庭及其村落社会结构,白莲的特性也会因此消失(表 3)。

表 3 制度性作物与弥散性作物特性比较

维度	制度性作物-产业	弥散性作物-产业
作物特性	单一种植、独占性、排他性、规避自然因素、周期短、作物自然属性受干预控制	多样种植、搭套、轮作周期长、顺应作物自然属性
产业特性	人工空间、资本密集、技术标准、劳动力素质要求高、雇佣劳动力、组织化生产	自然空间、要素投入少、技术简便、家庭成员为劳动力、周期性生产
市场过程	高利润、高风险、外部茬口市场、反季节生产、排他性竞争	综合利润、低风险、多样化商品、季节性生产
社会亲和性	与日常生活分离、被支配、打破传统、再造新生活方式	与日常生活契合、依附于家庭、经纪人体系等非正式制度

(二) 产业发展与乡土社会的内在关联

本文并非认为蔬菜大棚不适合乡村社会,只是弥散性的白莲给予了农民更多的市场机会,也更适应农民的社会生活节奏。一季白莲如果莲子的利润少,还可指望莲花、莲藕、莲叶等其他部分补充,但单一性的大棚蔬菜则是一损俱损的市场后果。大棚蔬菜缺乏像白莲这样的中间市场与复杂的经纪人制度为其进入市场、嵌入农村社会提供更多的软化路径,因而被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可能的选择之外。对于拥有深厚种植传统和良好社会基础的白莲来说,其问题在于如何吸收部分制度性作物特点,提高其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进而提高单位种植面积的经济效益。而对于经济收益可观的大棚蔬菜产业来说,基本问题恰在于如何扎根乡土。

实际上,若大棚蔬菜能如政府所愿出现数量众多的农户种植,也能形成集聚优势,甚至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但在农村现有的劳动力年龄组以及资本状况下,白莲乃至脐橙、烟叶等已成了当地农民综合效益的更优选择。大棚蔬菜对经营主体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真正能够担纲大棚蔬菜的青年农民却在外务工,留守在村的老年农民并不愿种植大棚蔬菜,这种产业与经营主体之间的错位是造成蔬菜大棚闲置、农民普遍不愿尝试的内在原因。

本属于政策导向的大棚蔬菜产业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及主推官员的换届而失去政策扶持,也因成本过高而陷入资本困境。这一后果表面看是因缺乏市场导致,实则是作物结构调整较大,引起产业体系失调,打乱了农民原有生计体系。大棚蔬菜若想顺利扎根乡土,需与乡村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制度相结合,在作物产业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民家庭及其社会生活的行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编织出成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农民进入的门槛,这样才能为小农户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创造更多的入市机会。当普通农户看到依靠本地社会关系营造的复杂协作网络时,也就有了从事大棚产业的信心,但这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需要本地有足够的市场基础,经营群体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是一个相互成长的缓慢过程。

在乡村,为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提供根本支持的是家庭制度。家庭基础上的村落共同体为村民委员会自治提供了合理性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内在动力。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经纪人组织则为各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动能。有些作物的经济功能与社会效益的发挥需要与家庭乃至村落社会有机结合才可实现。白莲的生长周期较长,但每个阶段都有可以进行市场交换的产品,并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采收加工。白莲在给予农民经济收益的同时,赋予了农民家庭生活与社会事务的完整性,甚至影响了经纪人组织以及专业合作社的产生,经纪人体系则赋予作物以生计产业特性。可以说,白莲产业能够成为农民家庭生计,主要依赖于当地层级叠加的经纪人体系。经纪人体系将分散的家庭串联起来,也将附着在家庭之上的白莲接入市场。大棚蔬菜缺少这样的经纪人体系,普通农户难以依靠自身

能力开拓市场,下乡资本也通过特定的渠道对接外部市场,并不能很好地链接小农户入市,导致蔬菜大棚市场更不稳定。

具体担纲两种产业的都是家庭,但作物的特性使它们与家庭结合的紧密度有所差异。制度性的大棚蔬菜几乎控制了农民家庭生活的全部行动安排,弥散性的白莲则与农民的家庭生活融为一体。这就是在几近相似的外部要素支持下,为何有些产业即使失去政策补贴仍可持久成为农民生计体系的一部分,有些产业则迅速淡出农民生活的重要原因。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农业社会学强调的农业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两重性出发,在整体考察贡县农民的生计体系、社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分析在同等的技术市场与社会转型阶段中,与蔬菜相比较,为何白莲更不易转型为制度性作物。本文的分析表明,传统的白莲产业并非不适应市场经济,也不是非正规的“低经济效益”。尽管新引入的蔬菜大棚产业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这样的经济效益并不一定带来同等的社会效益。

本文所述作物的制度性是指作物因市场、资本的强渗透性,具有相对制度化的生产管理与市场过程。换言之,制度性作物的特征不仅是指人类在掌握作物生长习性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的一套成熟且规范的作物管理经验,更意味着作物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干预而形成的规范性技术操作流程。这种制度性特征日渐独立脱嵌于经营主体的生活之外,甚至成为其全部的生活中心。一旦涉足此类制度性作物,经营主体的全部生活将不得不围绕作物习性来安排,甚至被异化成为作物的附属品,由此经营主体的生产成为主体,而生活沦为客体。这也构成经营主体逃离制度性作物的重要原因。作物的弥散性是指作物的生长习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特点与经营主体之间的契合融合。在弥散性作物联通的产业中,作物的生长周期、生产管理虽然也有技术改造的痕迹,但并不脱嵌于经营主体的社会生活之外,而是与之相辅相成。有些作物的特性易于形成制度式产业,有些作物则难以形成。这也是造成作物脱嵌于经营主体生活甚至反客为主的重要因素。

资本化运作后的大棚蔬菜具有快速生长、水肥需求大、技术要求高、品种单一、易遭遇病虫害、无法间作轮作、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高度重合等作物特性,使其产业必须有一定的制度性,才能在最快的时间内组织劳动力结合技术进入作物生产的各环节,加快生长的物候期,以踩准茬口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收益。大棚蔬菜产业的本质是类工业的标准化、去差异化与制度化生产。大棚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加工车间,资本搭建起可以隔绝自然要素影响的密闭生长空间,将农作物细化为具体的环节与相应的要素组合投入,具有独占性、排他性。为达成利润最大化,经营主体被迫从其生活的场域中剥离开来,成为制度性作物提供各项服务的“仆人”,其社会生活空间及生计安排被挤占。当资本的特性注入作物的生长过程后,前者与后者的特性相融合,作物就不再是纯粹而简单的农作物了,它已被资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工具。资本驾驭着作物的特性朝向市场大潮中策马奔腾,这其中也裹挟着作为经营主体的人。资本化后的作物特性,除自然的生长周期需要等待外,其余活动均在资本的控制下进行,甚至经营者也成为提线木偶。这是制度性作物的总体特征。

从根源上看,任何作物都具有生命性、季节性特征,并非所有作物天然都具有弥散性、制度性。但当市场裹挟着资本、技术进入农业生产以后,无论何种作物都具有了成为制度性或弥散性作物的可能,也相应地产生制度性产业与弥散性产业两种类型。而决定作物通向哪条道路的有以下几个关键:首先,作物的自然属性是否易于被资本、技术改造。如白莲、蔬菜都具有自然性,但相较前者而言,后者的自然性更易被干预,可按照市场的标准需求来规范生产,也就容易

在资本、技术的渗透下形成作物自身的生产场所、技术规范、管理流程与市场过程,独立于农民的生计体系、社会生活之外,自成为一种制度性产业。换言之,蔬菜之所以成为制度性作物,是因为设施技术、市场经济完善达到一定程度。而能被资本、技术加以高度市场化的作物,都有走向制度性作物乃至制度性产业的可能。其次,自然属性被改造过后的作物社会属性是否与经营主体的社会生活存在冲突。从庭院到大棚,蔬菜也历经社会化过程,可以说在庭院经济阶段任何一种小农园艺作物都具有弥散性特点,但被“大棚”后的蔬菜,其生产场所、技术规范、管理流程都与农民的社会生活节奏存在非此即彼的替代甚至占取特征。所以,从农民的社会生活中独立而出的制度性大棚蔬菜难以再回到弥散状态。白莲从庭院走向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其生产空间、技术管理虽都有一定的资本、技术化过程,但每个生产环节均穿插嵌入农民的社会生活,充盈丰富了农民的生活状态,因而可从分离走向弥散。

返回到杨庆堃先生的议题,制度性宗教虽经历了从世俗生活分离而出的系统化过程,但融入社区日常生活。弥散性宗教则借助价值与习俗,使人们对现有生活方式产生敬畏,并进一步稳固了社会制度,但制度性宗教则试图打破传统,将民众带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40]228-331},因此对待社会传统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两种宗教的不同命运。就制度性作物与弥散性作物而言,两者受资本、技术的影响程度不同,与农民社会生活的亲和性也呈现二律背反的状态。制度性作物试图将经营主体带入围绕市场与扩大再生产的生活状态,将生产作为经营主体的全部中心。弥散性作物则依附在家庭之上,使人们通过生产实践进一步巩固家庭制度。因此,决定制度性产业的命运是经营主体平衡家庭生活与产业发展的能力,而决定弥散性产业能否存续的关键是农民家庭制度是否存在解体的危险。

家庭为作物关联的产业提供了劳动力基础、技术改进及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无论是弥散性作物还是制度性作物都需与家庭做有机融合。我们不能忽视作物、产业与农民之间的社会生活机制,尤其是与家庭乃至村落共同体的关联性。在乡村,诸如白莲这样的弥散性作物有许多种,如果完全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所谓产业-家庭-社会生活的完整性,认为经济效益好的作物就应作为产业发展首要目标,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农民的抵制。这并不是说农民拒绝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说农民的取向是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兼顾家庭生计以及社会生活面向的整体性。在农民的意义悬置中,生活生产互为一体。农民的发展观往往通过诸如白莲这类弥散性作物体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筹兼顾的产业予以表达。单纯地强调经济收益从来都不是农民的真正价值取向,农民的经营行为实则为社会经济行动。

作物特性影响产业呈现出弥散性还是制度性,这将影响在乡村振兴中针对不同特性的作物采取怎样的产业发展政策。就比较优势而言,应着重考虑发展与农民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弥散性产业,适度布局制度性产业。制度性产业若想扎根乡土,则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不能强调经济发展而过分束缚乃至挤占农民的生活空间。在新的产业引入时,应充分考虑农民原有作物结构与生计体系的总体合理样态,找寻最适宜的嵌入方式。再则,并非所有的农业产业都适宜资本、技术集约化的制度性路径,产业发展可采取弥散性的方式推进。换句话说,并非资本化的制度性产业才是必然道路,弥散性产业同样具有现代市场特点,足可成为农业产业现代化的通途。农业社会学注重从作物出发考察作物、产业与乡土社会的适宜性,把农业置于宽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情境之中,探寻农业问题与社会总体的丰富关联,找到实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因。

参考文献:

- [1] 符平. 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8, 33(1): 169-193.

- [2] 涂圣伟. 我国农业要素投入结构与配置效率变化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7(12): 148-162.
- [3] 高强, 孔祥智.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总体估价与趋势判断[J]. 改革, 2014(11): 80-91.
- [4] 林万龙, 华中昱, 徐娜. 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实践困境与解决对策——基于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区若干贫困县的调研总结[J]. 经济纵横, 2018(7): 102-108.
- [5] 冯猛. 基层政府与地方产业选择——基于四东县的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2): 145-169.
- [6] 韩永辉, 黄亮雄, 王贤彬.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J]. 经济研究, 2017, 52(8): 33-48.
- [7] 牛若峰. 农业产业化: 真正的农村产业革命[J]. 农业经济问题, 1998, 19(2): 27-31.
- [8] 蔡海龙.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及其创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11): 4-11.
- [9] 罗必良. 农地确权、交易含义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科斯定理拓展与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11): 2-16.
- [10] 孙新华. 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兴起与突破性农业转型——以皖南河镇为例[J]. 开放时代, 2015(5): 106-124.
- [11] 姜长云. 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路径与逻辑[J]. 改革, 2013(8): 37-48.
- [12] 杜吟棠. “公司+农户”模式初探——兼论其合理性与局限性[J]. 中国农村观察, 2002(1): 30-38.
- [13] 郭晓鸣, 廖祖君, 付娆. 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三种农业产业化模式的比较——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4): 40-47.
- [14] 冯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业治理转型——基于皖南平镇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2): 23-32, 95.
- [15] 周飞舟, 王绍琛. 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 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 66-83, 203.
- [16] 严海蓉, 陈义媛. 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J]. 开放时代, 2015(5): 49-69, 6.
- [17] 陈航英. 土客结合: 资本下乡的用工机制研究[J]. 社会, 2021, 41(4): 69-95.
- [18] 王春光.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1): 86-103, 206.
- [19] 西奥多·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2版. 梁小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25-134.
- [20] 詹姆斯·C. 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 程立显, 刘建,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36-41.
- [21]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1-8.
- [22] 朱启臻. 关于乡村产业兴旺问题的探讨[J]. 行政管理改革, 2018(8): 39-44.
- [23]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63-69.
- [24] 费孝通. 禄村农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120-130.
- [25] 周飞舟. 一本与一体: 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J]. 社会, 2021, 41(4): 1-29.
- [26] 周飞舟. 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及范式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3): 21-38.
- [27] 付伟.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产业与家庭经营——以S市域调研为例[J]. 社会发展研究, 2018, 5(1): 81-101.
- [28] 付伟.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6): 71-90.
- [29] Michael C. The 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22: 111-120.
- [30] 徐宗阳, 焦长权. 茶与城镇化: 新时期乡村经济生态的案例研究[J]. 学海, 2016(4): 124-133.
- [31] 熊春文, 桑坤. 作物结构、生计体系与产业扶贫的有效性机制——基于华东一个县域的经验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3): 75-85.
- [32] 熊春文. 农业社会学论纲: 理论、框架及前景[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3): 23-47.
- [33] Patrick H M. My Own Boss? Class, Rationality and the Family Farm[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8: 257-260.
- [34] 熊春文. 疫情应对中农户生计与粮食安全[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 40(11): 5-12.

- [35] 桑坤. 农业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 学术争论与价值意涵[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6(2): 11-23.
- [36] 李阳阳, 熊春文. 劳动过程视角下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条件——弗里德兰的《制造绿金》及其启示[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3): 97-105.
- [37] 黄功标, 杨秉业, 陈均. 连续2年稻草还田腐熟对连作烟田土壤性状及烤烟产质量的影响[J]. 江西农业学报, 2014, 26(4): 46-49.
- [38] 符文葵, 周红梅, 王春玲, 等. 白莲腐败病发生规律及防控对策探讨[J]. 江西植保, 2011, 34(2): 83-85.
- [39] 詹姆斯·C.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 王晓毅,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284.
- [40] 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 范丽珠,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 刘浩)

Institutional Crops and Diffuse Crops: Mechanism of Crop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a County in Central China

SANG Kun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wo crops which are in the same cultural location and have similar policy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process are very different in terms of industrial results. The academic circle focuses on the explan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s industrial governance, market logic and even farmers' livelihood choice, but fails to fully explain the forethought causality of crop to farmer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crop characteristic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sociology emphasizes the duality of agriculture, highlighting the indivisible integration of crop naturalness and sociality, and touch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crop-industry-social lif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white lotus and greenhouse vegetable crops and their related industries in Gongxian County, it is found that crops can be divided into institutional crops and diffuse crops by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is feature has a pre-correlation, resul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crops with the market and farmers' social lif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institutional industry and diffuse industry. Institutional crops and diffuse crops connect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market process of the industry, further affecting the actual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industry and inducing the social life pattern of farmers, so that some crops can take root smoothly in the countryside, while some are not accepted by farmers. Institutional crops and dispersed crops have their own reasonableness. Industrial leaders who had intrinsic affinity with locals should be foun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local crop structure, livelihood system, labor conditions and other people's conditions to facilita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rop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Crops; Diffuse Crops; Agricultural Sociology